

他们是谁? 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,大时代里的小人物

二十多年前,杨遥大学毕业,在家乡山西当乡村教师。村里人多,大人小孩都在,每个村子都有小学,孩子们上学比现在方便,也不用家长接送。当时乡镇基本工作是计划生育和农村税费改革。杨遥回忆,那时乡村相对完整,老少几代都在一片土地上过日子。

又过了10年,杨遥成了乡镇干部,当上了副镇长。乡镇的中心工作和从前已大不一样了,农业税已经免除,处理各种信访事件成为主要任务。直到2015年,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开始吹响。2017年,山西省出台政策,各省市县单位派干部深入基层,杨遥被省作协安排去扶贫点挂职,担任副乡长,协助分管当地扶贫工作。晋北人杨遥第一次深入晋南的乡村,他说,以前也在农村生活,觉得自己对农村很了解,挂职后才发现,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

晋北多平川,交通便利,物资也丰饶。杨遥挂职的地方坐落在山区,四周尽是黄土高坡,地貌学叫黄土塬——顶面平坦宽阔、周边为沟谷切割的黄土堆积高地,从高处看就像一道险峻而贫瘠的土岭。

“交通很不方便,距离倒不远,但是比去趟北京还费劲。”杨遥从太原坐大巴到县城,再坐班车到挂职的乡镇,一天两趟。整个乡镇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,从东走到西不用了十分钟。杨遥住在一个三人间,上下铺的宿舍。旁边不远处是乡里的大灶,一个大火盆,墙角堆着炭,旁边是锅灶,墙上挂着零星炊具。

杨遥和另外两位作家为了写山西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,也为了全面深入脱贫攻坚战场,三年,杨遥几乎跑遍了山西的58个贫困县,“亲眼看到的变化超乎想象”。水、电、路、网、通讯……脱贫攻坚开始前,很多村子连基本生活保障都不具备。原来山区的村子修旱井,下雨或下雪时,水蓄到井里,一家子用水就指着这口井。平时洗脸、洗手,小孩洗完大人洗,习惯了,没人觉得不干净。而现在山上的村子,只要有几户人家,就都通了水,修了水泥路。

因为地理原因,异地搬迁成为山西很多贫困县脱贫攻坚的主要举措。按国家政策,每户每人不超过25平米,还有搬迁补助。新落成的移民小区同步配套了超市、医院、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,有的还专门建立了老年看护中心。但对很多老人来说,土地是他们最后的驻守。一个老人跟杨遥聊天,一说到搬迁就哭了。“他以前在山里自己种菜,搬下来买葱买土豆都得花钱。”改变与适应总是艰难的,好多不愿意搬迁的老人,到新小区住上一段时间,习惯了之后也觉得比山里优越很多。

国家脱贫攻坚的主要政策是“两不愁三保障”,不愁吃、不愁穿,保障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。在各类扶持和补助下,贫困县的基本生活得到很大改善。杨遥说,不是说农村就意味着贫穷,真正困难的,要么是家中有人得重病,开销大负担重,要么是因为发生事故缺乏劳动能力;还有的是违背计划生育政策,孩子越多,也越来越穷……针对这些情况,政府都出台了相对应的扶贫措施。

杨遥觉得,通过脱贫攻坚,农村与其他地区甚至时代的距离拉近了。“以前的农村比较封闭,掌握话语权的老人常有血缘关系,脱贫攻坚展开后,外部力量的引导与监督为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大家有了一种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”

让人们有为之努力的事儿,有念想,有希望,比单纯的物质补贴更长远。杨遥走访的贫困县里,有的村干部能干,带领村民一起,以前种蔬菜,现在种药材,或者开发新的养殖产业,改变以往单一的务农模式,增加新创收,比如服装加工业,近年来涌现到了北方贫困山区。外面工厂接到订单再分到村里,“一天50块钱左右,一年下来也有点小两万,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收入”。村里妇女除了带孩子做饭,也相当于就业了。

还有不少地方根据风景特点开发旅游业。杨遥走访过一个村子,依山傍水,建设得特别漂亮。村子一年旅游收入近百万,村民们开个小吃店,做做饭,或者打点零工,收入足以改善生活。一些头脑灵活且有见识的企业带头人,看到了国家和政府对扶贫的投入力度,将阵地转移到农村。杨遥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,“以前开焦化厂的,回乡弄了个香菇养殖场,从人力、设备到技术,都是最先进的。还认识一个以前开煤矿厂的,现在转到农村养鸡,规模特别大,一年产值过亿,还吸引了很多其他行业投资,他一个人,一件事,就能带领全县人脱贫致富。”

走一遭下来,杨遥感觉,现在农村里还有一部分人思想相对固化,需要拉一把,推一把。凡是有想法、愿意干的人,精气神饱满,发展得也相对好一些。网络的便捷让村民们接触到了更丰富的讯息,“以前农村也有变化,但不是特别大。这几年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多了,机会也多了。”

杨遥到过武乡县,山西省长治市的一个老区,那里“微商”成了潮流。有意思的是,做微商的人大多在40岁以上,最大的70多岁,他们在手机上卖当地土特产,“绿色环保纯天然食品”。好的时候一年下来收入几万块钱,对村里人来说足以改变生活。为此杨遥写了一部微商题材的中篇小说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

“日子好了,生活水平高了,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提高了。现在原有贫困县的生活能达到基本标准,以前的贫困户也不局限于满足简单生活需求。”杨遥去过一个村子,做装黄粟的特别多,他问村书记,你们装黄粟去哪?书记说,心有多大,去的地方就有多远。

杨遥还遇到过一个月嫂,38岁,经过正式培训后上岗,在山西当地干了一阵,去了太原,又跑到汕头,在汕头得知深圳月嫂挣得多,于是买了机票连夜出发。今年初她联系好了涉外机构,本

重新生长——三位作家和他们的扶贫故事



杨遥同村民交谈



沈念走访贫困户



朱朝敏在贫困户家里采访

来想去加拿大当月嫂,因为疫情没去成。在家的几个月,自己花两万块钱考了5个证。“人家说学习不能停,懂得多了,专业了,自然雇得人多。”杨遥说,“现在村里有规划、有追求的人不在少数呢。”新来的村干部想在元旦办乡村晚会,担心没有多少人参加,结果报名的人很踊跃,与贫困户斗争的人们对美好事情也有追求和期待。

说到扶贫干部,杨遥第一印象是辛苦。真正深入农村不像一般采风。以前有同事下去挂职,回来和杨遥讲脱贫,讲第一书记,杨遥还不理解,等真到了脱贫攻坚中的农村,才明白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。“各种检查各种表格各种你要解决的,家里的事情啥也顾不上。开展工作也不是简单的逻辑和决定,往往办一件事,有很多客观因素牵制,很不容易。”杨遥感叹,“刚开始老百姓对你也不信任,工作真的挺难的。”

在发表于《中国作家》的长篇小说《大地》中,杨遥写了驻村干部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体验。每一位扶贫干部背后都有父亲母亲,有丈夫、妻子、孩子,他们为“大家”时,怎样爱“小家”?在这部小说里,杨遥始终坚持一个朴素观点:老百姓喜欢的到底是能和他们走到一起的、贴心的干部。办实事办好事的人,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。

变化在哪? 村干部也好,村民也好,开始真正思考起来

“以农为生的人,世代定居是常态,迁移是变态。”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经典之作《乡土中国》,沈念读过十余遍。很多精彩的论断,藏着丰富而开阔的释义。从2019年初至今,沈念深入乡村,在具体生活中找到成为“释义”的释义之证。

去年初,沈念还在学校准备论文答辩,单位安排他借调到省委脱贫攻坚督查组,前往湘南山区。沈念生活在湖北平原,参与扶贫工作每次下乡十天半月,选一个乡镇居住,早出晚归,连点带片把周边村镇的督查工作完成。如此每月往返十余次,每次带着不同任务,沈念走过了湘南山区的100多个村庄。

“督察”是国家制定的各项衡量标准,比如饮水是否安全,道路是否便捷,危房改造质量如何,扶贫款项有没有落实等。每个小组到一个村子,要按照指标随机入户走访。督查主题也不同,有的是看卫生情况,有的是看异地搬迁安置情况。督察组单独行动,食宿也都自行安排,希望能真正面对老百姓,了解真实的情况。

“贫困村的变化很大,基础设施有了很多改变。扶贫干部能力强,单位实力强的,变化更明显。”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实地摸底,没达标的建档立卡,对口进行脱贫帮扶。家门口挂的牌子上写着哪一年入贫,哪一年脱贫。去年沈念再去时,没有脱贫的人家已经很少了。

湖南省永州市华江瑶族村,有近千年历史,是沈念申报的中国作协深入生活项目所在地。村里有一百多户、六百多人,以前是贫困村,驻村的扶贫干部干了三年,定点扶贫单位援助山区整体搬迁,投入四千万,新建了独立楼房,发展民宿等乡村旅游,改善了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。沈念住的那户人家,女主人参加了村里的舞蹈队,有游客来了进行表演,其他时间干干农活,经营住宿,“有的人家还开了杂货店,虽然人气不是很旺,每月也能增加2000元左右的收入,再加上家里有人外出务工,可以说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。”

下乡督查,沈念接触了很多扶贫干部。“他们工作都很忙碌,脱贫攻坚时间久,各种各样的事情下达到基层,都负担在他们身上。”沈念说,“大家都很有责任心,每个人做事方式不同,思考问题角度不同,能力大小也不一样。有的人最初意识不强,但有扶贫工作队层层把关和检查,扶贫干部们整体上精神面貌是积极的,勤恳用心的。”与沈念同行的村干部,有几位是“老扶贫”了。其中有位老处长,从2014年起就到了县驻村扶贫,先当了三年扶贫队长,接着干了两年督查,从县里到村里的干部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。聊起几年来的经历,他们有时眉飞色舞,有时也心情沉重。

有想法,有干劲,扶贫真做起来,具体到每个项目,每个细节,很多时候甚至会遭到重重困难。沈念说,扶贫这两个字听起来简单,但并不是单纯投入资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,实际中可能会遇到村民不理解不支持,县乡对接不到位,相关人员对于工作想法不一致,还有自然生态的客观阻碍等大小问题。乡土社会的变化与迁移成了基层干部面临的难题。扶贫工作中有很多这样关乎老

百姓切身利益的事,除了沟通和协调,更需要设身处地地想,多一分理解的温度。

一路上,他们讲酸甜苦辣的经历,印在沈念心里,不只是故事素材,更是人性在生活中的吐丝结网、落地生根。扶贫干部与贫困村、村干部、村民的关系成了扶贫发展中的微妙之处,对美好生活向往也就有了不同的追求方式与抵达结果。

短篇小说《天总会亮》就是沈念扶贫经历的文学产物之一。关于一个残疾家庭摆脱贫困、信念重建的故事,沈念选择以孩子的视角折射扶贫带来的生活之变。进入乡村,深入脱贫攻坚现场,沈念前后写了5个中短篇小说并将集结出版。最初,他未曾想到会写这个题材的文学作品,“及至深入乡村(扶贫)一线的人事之中,我被身边的扶贫人、乡村之变所感染,也因此对乡土有了不同层面的思索”。

湘南山区的房子大多建在山上,沿着修好的乡村公路,房子零星,屋门紧闭,询问后才得知,主人不是到山上种地,就是到镇上或外地打工,留下少数的老人孩子。山路多弯,走到一个坳口,见一个长相奇特的老人坐在一幢老旧房子的屋檐下,望着通往山下的路,沉默不语。家中只有老两口,男主人76岁,女主人68岁。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,男的放牛,遇到大雨,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,被一棵树拦腰救下,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,脑袋整个凹进去一大块,他就是刊登于《十月》的沈念中篇小说《空山》中,易地搬迁钉子户“彭老招”的原型。

老人有一个儿子,1977年出生,6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。老人已不再有能力外出寻子。去年市委领导走访到此,开始帮着寻人。

这些千里之外遇见者的人生,大时代里的芸芸众生,他们难以言述的心情唤起了沈念的创作冲动。写作《空山》,是沈念在下乡途中进行的目的体量最大的一个作品,“更深层的原因是,在乡村建设铺天盖地的当下,他们就是我们,谁都不是独立的存在。”

聚焦于平凡的生命,聚焦时代洪流之下的变迁,沈念写下此刻乡村发生的现实,更多隐含着对乡村命运的思考,充分理解,才能融入、改变与重建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,不少人忧心乡村的淳朴自然是否会在前进中消失,在沈念看来,守和变,是一种能量守恒。

“一方面乡村同城市接轨,一方面是自身的建设。不同地域有不同特点,不同人群也有不同发展方式。乡村未来的发展道路漫长,需要真正的有识之士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,如何科学发展,形成良性循环,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”

今年上半年,沈念去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,当地政府专门请了北京的设计团队,对10个村进行规划设计。团队负责人是平江人,带着建设家乡的理想回来,地方政府提供财力与精神双重支持。设计团队根据村庄布局、地貌、房屋建设、人口资源、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整体布局。沈念有很大触动,如今乡村在发展变化,需要真正懂这片土地的人合理规划,从全局出发考虑。沈念到山上去,有时能看见花费上百万修的公路,异地搬迁后,山上的人搬了下来,公路就闲置了吗?能否在山上建设其他项目,使公路用上别的用处,这些都是沈念行乡途中思考的问题。

“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,脱离了贫困,乡村建设还有其他问题存在。经过这一轮精准扶贫,乡村整体基础设施提升很大,未来更需要巩固和保障它的成果,让已脱贫的贫困户减少遭遇疾病和灾难的返贫风险。对这次未划入到扶贫范围内的家庭,也需要给予必要关注和相关措施,要使发展步入良性循环。”

沈念觉得,未来乡村建设应该更好,既有自然的淳朴气息,也适宜于人们便利地居住。

去年初,沈念在一个“千年瑶寨”住过几天,他想追溯此地的“千年”来历,可原生态的民族地域文化少有踪迹,倒是见识了逢年过节广场上表演的长鼓,大小不一,长短不同,也有几只上了年岁的老鼓,让他对瑶族的长鼓艺术建立了初印象。后来,他见到了村子里一位专门从事瑶族长鼓舞表演的民间老艺人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明华。

矮个子,戴顶鸭舌帽,其貌不扬的赵老从屋里走出来,打开话匣子,和沈念反复讲述老人离世的过程,声音颤颤的,像是感冒了。这一次交谈让沈念从山村回城之后,耳畔还时常响起临走问赵老还打不打长鼓时的回答:“打不便了!”一个“便”字,道出了生活里的曲折起伏、得失悲欢。费孝通说,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。如此细思,长鼓舞传承人

的“当前”,既有着个人“过去”的投影,也是一个民族“过去”的投影。在传承的主动与被动、记忆的存留与舍弃之间,沈念创作出了中篇小说《长鼓王》,发表在2020年第7期《人民文学》。

参与脱贫攻坚,沈念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对人心智的改变。“大家的观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。现在很多地方,村干部也好,村民也好,包括扶贫工作队,都是有主动性的,开始真正思考起来。”脱贫攻坚为乡村打开了一扇窗口,村里的百姓们以新面貌对生活,对未来,燃起了新的希望。

我又如何? 就那么一眼,我就知道我将收获什么

写完《百里洲纪事》,朱朝敏几乎被掏空,再也写不出一个字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还停留在记录的那些事情上。现在,朱朝敏又开始写作了,有了许多新想法,“我无法说清这里的秘密所在。”

百里洲几乎是朱朝敏童年和少年的记忆,她在那里成长。那时,百里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,地势较高,堰塘、深潭、沟渠遍布,因为地处长江水流之中,每年夏季都要遭受或大或小的洪涝灾害,所以当地人建筑房屋时必须先筑高台,再在高台上建屋。百里洲由千年泥沙堆积而成,土壤适合种植棉花和沙梨,洲棉和沙梨闻名全国,也给当地人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。

后来,受到经济大潮冲击和交通不便的影响,百里洲日益衰败。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少,种植棉花和蔬菜因农药使用过度,造成了土壤和水流的污染,还有不少农民中毒,医治好也留下了身体残疾和精神问题。“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。”

2017年,朱朝敏参加全市精准扶贫工作,负责联系4户贫困户。一趟归乡之旅,逆着时光的河流溯回故土,恰恰与文学曲径通幽了,“文学就是追根溯源啊”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湖北几百万人次的干部群众参与精准扶贫工作,枝江就有上万名扶贫干部投身其中。百里洲镇因为四周环水,经济发展缓慢,贫困人口有6000余人。脱贫攻坚以来,百里洲镇每年减少300余名贫困人口。2017年下半年精准扶贫工作加大力度、全面铺开,湖北省很多单位联系了相应的乡镇村庄,不仅公务员对口帮扶贫困户,其他在编在岗的人也安排了联系对象,每人一到五户不等。朱朝敏说,帮扶机制包括驻村工作队,专职驻村人员一周五天四夜守在村里,其他帮扶人员每个月必须联系帮扶对象一到两次。

2019年,朱朝敏得到了中国作协“定点深入生活”项目的扶持,到百里洲下乡更为频繁了,几乎每周都去。几年来,帮扶干部与帮扶对象彼此熟悉,甚至成了亲人般的关系。“今年疫情期间,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用电话联系,彼此鼓励祝福。帮扶人员一起想办法帮他们销售农产品,比如蔬菜、鱼、蜂蜜、菌子等,可以说,我所知的贫困户,没有一家因为疫情而导致农产品浪费。”

百里洲所在的宜昌市枝江市,少山地,扶贫工作不涉及异地搬迁,在帮扶工作中朱朝敏注意到,所谓的贫困户几乎没有因为懒惰等主观原因,“恰恰相反,尤其那些重点贫困户,他们内心敏感,极有尊严感。但是,他们经济收入少甚至没有,致贫原因几乎都是因病致贫或因残致贫”。天灾人祸难免,“可是,烦也不能抛弃这个家啊”。

现实的乡村就是精准扶贫政策下的当下乡村,是民心民情最集中的地方。朱朝敏在《百里洲纪事》后记里写到:“几乎每天,都有烧心的事情发生,那些事情总是融合了前尘旧事,即刻生存状况和未来的思虑,换句话说,某个特定时间的事情,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它包含了时光的味道,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沧桑感,其复杂性迫使你去了解去交流去思考,关于生老病死,关于世故人情,人心人性,关于时代环境,关于精神向度。”

参加脱贫攻坚以来,朱朝敏几乎走遍了百里洲镇的每个角落,采访的家庭和帮扶人员近百名。《百里洲纪事》记录了脱贫攻坚一线的12个故事,12种脱贫之道。但无论哪一个,均关乎心灵和精神,聚焦人的遭际,人的蜕变,人的喜悦,人的绝望,还有从绝望中生成的光亮。朱朝敏觉得,自己之于他们,是聆听者,也是一名接受恩赐的受惠者。

选材时,朱朝敏没有特意考量写哪个,“与他们交流时,我被感动了,就决定要写他们及帮扶人员艰难创业的事情。”无论如何卑微困窘,他们向善向上追求美好明天的精神,犹如萤火之光,熠熠闪耀。在朱朝敏眼中,他们不幸遭受了困

顿,值得同情,更值得理解。谁又能那么幸运地躲过所有困厄呢?采访中,听到他们的叙述,朱朝敏觉得,自己和他们没有区别。“我要写出他们在羁绊下的挣扎,写出他们的蜕变。我知道,他们(包括帮扶人员)的灵与肉都在变化,在变化中完成了个体和时代的彼此构建。我想,这才是文学笔调下的脱贫攻坚战记录。”

在百里洲,朱朝敏深深感到,弱势者的心理困惑,大多数时候以“贫困”面目显形,换而言之,“贫困”有多深,心理问题就有多深。因而她写下这样一段话:假如当下中国的叙事不给予乡村中弱势群体心理以足够关注,是无法反映出这个庞大群体内心的困惑的。解答不了内心的困惑,精准扶贫也就只能停留在一些即时的表面状态上。

采访了许多家庭和帮扶对象后,朱朝敏发现自己“小瞧”了她的亲人和这块土地。书中12个故事涉及到的12户帮扶对象,朱朝敏曾在不同时期去探访过多次,并为每篇文章写下了了一篇后记。开篇《塔灯》里的主人公杨勇,两个儿子今年因为疫情一直待在家里,父子三人相处大半年,闲着没事,就大面积地种植花菜、蒜苗、辣椒、豇豆等等,他们的对口帮扶人员是朱朝敏的先生,他组织亲朋好友买了他们所有蔬菜,到8月份西瓜成熟,又联系某单位工会全部购买。8月份,杨勇两个儿子分别出去打工,收入比去年增加不少。朱朝敏后来了解到,他现在的心思更多放在大儿子结婚的事情上,人有了憧憬,心情好了,精神面貌自然大有改观。

朱朝敏的单位同事个个都是扶贫干部,所在城市里的同学和朋友也都是。精准扶贫开展以来,下乡是常态,入户走访有时还帮着农户干些农活,与他们唠嗑了解家庭琐事、收入……“时间长了,彼此什么话都讲,关系比亲人还亲。”朱朝敏说,随着各种政策和帮扶措施出台,农村的物质贫困消减了,心灵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。“他们道出来,说给你听,作为帮扶人员,去共情,去理解,去想办法解决。同时,他们也在帮扶过程中被砥砺出宽广的精神世界,这是双向构建和成长。”最重要的是,真心真诚地对待扶贫对象,以心换心,建立一种亲人关系,只有获得彼此信任,才能打开对方心灵。“这些基本都是工作,看似简单,实际琐碎,极需耐心和细致。”

精准扶贫的核心词是现场感,精神与身体都已深入百里洲的朱朝敏觉得,距离无法避免地存在。“但又感谢这个距离,给予观察者和记录者一个喘息的空间,去发现去思考。”能够写作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作品,朱朝敏认为是一种幸运,因为乡村,也因为文学。两者的彼此渗透,才能将生命的复杂性全盘托出。

脱贫攻坚下的乡村,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繁衍与新生。也有人担心,某天乡村记忆也将被束之高阁,对此朱朝敏赞同又不赞同。“我还是想说,乡村对中国人而言,是千百年来延续的一种公众情绪,早已融化于我们的血肉和骨髓里。……它统率了我们的口味、方言和精神认知,还规避了一些禁忌。这是源远流长的河流。所以,高楼大厦矗立的城市,归根结底,也是乡村的秘密衍生。”

乡村之于中国,如同百里洲之于朱朝敏。百里洲是她的故乡,童年少年甚至部分青春时期她都在百里洲度过,对它的了解深入骨髓。然而,有时又觉得陌生,犹如面对一方异域。18岁以前她曾下定决心要远离它。终于,朱朝敏和两个姐姐走出了百里洲,朱朝敏离它最近,仅仅一江之隔。

现在,三姐妹都已到中年,时不时在微信里说起故乡。那恰恰是一种见证,见证了生命的成长,见证了人对世最初的理解。就在镜子般的见证前,朱朝敏明白了,今生,无论离百里洲多远,实际都摆脱不了它的调整。这次因为扶贫重返百里洲,朱朝敏重新调整了角度和视野,就像镜头拉长拉宽了——宽阔无垠的背景,那些熟知的故土人物不经意就闯了进来。

“就那么一眼,我就知道我将收获什么。”

包含二维码、中国作家网 logo 及“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.chinawriter.com.cn 本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”等文字。